



論中國崛起：中、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觀點

A Study on China Rising: Perspectives from “Chinese Schoo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董慧明 中校 (Hui-Ming, Tung)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提 要

本研究嘗試探討中、西方國際關係學者對於「中國崛起」議題之看法。其中，除了針對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以及「中國學派」建立之重要內涵予以評介外，亦對於中、西方在「中國崛起」與「和平發展」二種不同立場的理論詮釋加以討論，進而發現當中國融入國際體系並接受國際建制規範時，「形象」建立等軟權力策略的運用，是其向國際行銷和平發展觀點之關鍵要素；另「中國學派」提出「天下體系」觀點，亦有可能成為形塑東亞國際秩序之思維模式。

關鍵詞：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社會建構主義、中國學派、中國崛起

Abstract

This study intends to explo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School” and western scholar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ward “China Rising”. First of all, this study quotes the research approaches of the “Chinese School”, neo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m, traces the established status and main viewpoints of the “Chinese School”, and also analyzes connotation of eac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Secondly, “China Rising” and “Peaceful Development” are different to China and the world. When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is continually promoted, joined mos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accepted the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he serious problem of China is to make her national identity more flexible. That is, in order to obtain the trust of the other countries, China may use “soft power” to modify her “image”. Furthermore, the “Chinese School” is not a mature school, especially the controversies in methodology, and needs to be integrated. In these differences, “All-under-heaven System” is the most special point amo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In East Asia, China want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thought to build a “Benevolent Rule” order instead of “Force Rule” one. This study provides plural perspectives when we inquire “China Rising”, and find out applicability and limita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Keywords: neorealism, neoliberalism, social constructivism, Chinese School, China Rising

壹、前言

邁入21世紀的中國，其高幅度的經濟成長與綜合國力的提升，已成為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容忽視的政治現象。而若以2011年為一分界點，將時間向前推算30年，並且回顧當時中國與西方世界歐美國家的發展，可見於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中國正處於一場「改革派」與「保守派」在國家發展路線上的權力鬥爭，而其爭論的核心議題是「姓社姓資」這種意識型態的問題。與此同時，西方世界的已開發國家，尤其是以英、美為代表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制度，正隨著向世界上各個發展中國家行銷其民主與自由價值之際，同步地在全球蔓延著。另一方面，在學術領域中，亦在此時興起了後行為主義(post-behavioralism)以及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之風，其中有關國際關係各種新理論不斷被提出、爭論，其中又以Kenneth Waltz為代表的「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與以Robert Keohane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在當時所形成的國際關係理論第3次大辯論(Great Debate)最引人矚目。¹由此可知，這些東方與西方國家轉型發展的實際情形或是學術領域各種理論途徑的建立，自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這個時期開始，為30年後國際政治的變化，巧妙地擦出了令人注目的新亮點，即：當中共於1978年12月召開「第11屆三中全會」，確

立了改革開放路線，象徵著以「改革開放」為理念的領導階層在權力鬥爭中獲得了勝利，而在這種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無論是堅持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還是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無可諱言的是，來自西方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在一定的程度上仍對中國的改革轉型發展產生了影響，而當中國國家發展模式已令世界聚焦關注時，更可發現此一政治現象對於國際體系、國際建制和國家身分認同等亦發生了程度不一的改變，使得「中國崛起」不但成為了一個在學術上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議題，亦成為國際政治中有關大國崛起所不能忽視的政治現象。

中國的崛起，不但為西方已開發國家所關注，也引發中國內部國際關係學者的關切，其中又以「中國學派」的建立為例證。因此本研究嘗試以多元的角度檢視中國崛起的最大動因。從方法論(methodology)的角度觀之，無論是自然科學或是社會科學，「理論」(theory)總是能夠幫助研究者在渾沌不明的現象中，指出明確的研究方向，並且對已知的現象提出合理的描述、解釋甚或進一步對其未來的發展加以預測。因此，本研究欲藉由對中、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探討，冀能明確地解讀30餘年來中國崛起發展的脈絡，且藉由理論的適用與侷限討論，能夠發掘中、西方學者當前在採用國際關係理論詮釋中國崛起時，各種理論解釋力的強弱差異。

1 關於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辯論之分類，學術界概有3次大辯論與4次大辯論之不同認定。其中第1、2次之「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以及「科學行為主義」與「傳統主義」之論辯較無爭議，而第3次之「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等典範之爭辯以及第4次「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論辯，則受到學者Ole Wæver、Yosef Lapid和Emmanuel Navon等人因看法不一而多所爭論。本研究採用Wæver所稱「典範間辯論」(inter-paradigm debate)之主張。see Ole 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Steve Smith,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49-185.

貳、中國學派與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對話

國際關係理論的發源，一般皆以1618年因宗教革命引發「30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 1618-1648)後，由西歐地區各交戰國在1648年所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為共見，而由這種以主權國家間所形成的國際關係結構，則造就了日後各國際關係學派在建立理論的基礎。相對於西歐國家的發展，中國在不同的歷史環境背景下，亦發展出屬於華夏文明的朝貢體系(Tributary system)，並且成為19世紀中葉前，中國在處理涉外事務的依循原則。而在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歷經四次的辯論後，逐漸呈現出以「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為主軸的理論體系，另當建立「中國學派」(Chinese School)的呼籲被提出後，更可發現中、西方國際關係學者在理論建構的對話上愈趨活躍，對於研究「中國崛起」這個政治現象，提供了豐富多元的觀點。

一、西方的主流國際關係理論

(一)新現實主義

學者Kenneth Waltz與Robert Gilpin二人，為了補充現實主義(Realism)的不足，曾以國際結構(structure)與體系(system)之論述，描述、解釋與預測國家行為。²其中，Waltz將國際政治視為一種定義精確的結構體系，結構係以系統的排序原則來界定，且被定義為單元間能力的分配與單元能力對比差異的程度，國家則根據權力的大小而佔有不同地位，³進而發展出現實主義的權力論。⁴

Waltz認為世界是物質力量構成的，反應在國際政治結構時，係指大國軍事力量在國際政治結構中的對比排列，且假定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anarchy)的自助(self help)體系，國際體系的結構決定著國際體系成員之間的政治關係。⁵各國為了追求安全的目的，必須以權力作為手段，而在國家行為中，國家大致採理性行為方式。⁶

(二)新自由主義

學者Robert Keohane與Joseph Nye於1977年提出了「複合互賴」(complex interdependence)的觀點，⁷強調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以及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⁸對於協調國家之間的關係具有重要作用。此外，Keohane於1984年出版的《霸權之

2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p. 38-93; also see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23-34.

3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97.

4 Giorgio Domines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n American Science Towards a Pluralism of Thought,” *Transition Studies Review*, Vol. 16, No. 4, February 2010, p. 818.

5 David Malet, “Faith in the System: Conceptualizing Grand Strategy in the Post 9/11 World Order,”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1, Issue 8, August 2008, p. 725.

6 Martin Griffith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13.

7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New York; London: Longman, 2001), pp. 20-32.

8 Keohane將國際建制定義為：一種持續、相互關聯之正式與非正式的規則體系，這些規則體系可以制約行

後：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World Political Economy)一書，更深入地探討了霸權與國際建制之間的關係，作者認為霸權國家所主導建立的國際建制會在霸權國家消失後繼續發揮原有的作用，而在國際建制的協調作用下，國家之間的合作，將成為國家之間政治關係的主要議題。

其次，以他們二人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指出國際體系特點除了結構之外，還包括「進程」(process)，⁹而影響國際進程的2個因素是「體系結構」和「國際建制」，其中又以國際建制為國際體系中最主要的特徵。¹⁰新自由主義主張可以透過建立國際建制來克服政治市場失靈，使得無政府狀態下國際體系仍處於有秩序的狀態下。¹¹因而在新自由主義理論中，影響國家行為最關鍵的變數就是國際建制，而國際建制也決定了國家行為。

(三)社會建構主義

相較於新現實主義注重權力、新自由主義注重相互依賴等觀點，社會建構主義主要在探討人類意識及其在國際關係中的角

色，以及國家認同和利益的形成。¹²在這個學派中又以美國學者Alexander Wendt所提出的觀點最具代表，他從社會建構的觀點詮釋國際體系的內涵與特徵，¹³將國際體系視為社會體系，強調在國家行為與利益的形成過程中，「認同」、「規範」與「文化」等因素對於行為主體(agent)與體系結構間的互構關係具有重要作用。

Wendt認為行為主體的互動構成了共享知識(share knowledge)的社會結構，而結構又建構了行為主體的身分與利益，如此相互循環作用，形成國際社會建構的最大特徵。¹⁴其次，在探討認同與國家利益之間的關係部分，Wendt首先將認同界定為行為主體「對自身相當穩定的、特定角色的理解和期望」，¹⁵而這樣的自我領悟則會決定國家利益。

二、「中國學派」的國際關係理論觀點

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一般常以「中共11屆三中全會」以及1979年鄧小平提出：「要加強世界政治的研究」¹⁶等意見時為一起點，主要是為因應當中國必須面對複雜難解的國際事務時，國際關係學者用以詮

為體的活動、界定行為規範，使行為體的期望值趨於一致。見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4, December 1988, p. 383.

9 Joseph Nye,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orld Politics*, Vol. 40, No. 2, January 1988, pp. 22-30.

10 Andreas Hasenclever ed., "Interests, Power, Knowledge: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0, No. 2, October 1996, pp. 220-221.

11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81.

12 莫大華，《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研究》（臺北市：時英出版社，2003年），頁70。

13 張亞中，《國際關係總論》（臺北市：揚智文化，2007年），頁92。

14 秦亞青，〈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溫特及其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美歐季刊》，第15卷第2期，2001年夏季號，頁231-264。

15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Spring 1992, p. 397.

16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58-184。

釋與評估中國處理國際事務方式的學理根據為何。而隨著中國國際關係研究愈趨成熟，近年來在中國學界更提出了創建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的倡議，¹⁷只是迄今「中國學派」因內部意見的分歧而無法提出較具體的國際關係理論，¹⁸目前的發展仍是以中國學派學者在西方傳統主流國際關係理論脈絡下，結合中國實際的國情發展提出的觀點較為明確。

(一)新現實主義—國家安全利益的觀點

受到新現實主義學派的影響，在中國國際關係學者中，有以「國家安全利益」看待中國崛起之觀點。他們強調的重點在於國家安全利益和軍事實力的作用。例如：學者張文本認為：國際政治的原則至今仍是叢林的原則，中國只有脊樑強硬，和平機會才會更多；只要有所準備，才有可能爭取到和平。¹⁹另學者閻學通亦認為：國與國之間的戰略關係首重國家安全利益，其次才是經濟利益。而學者潘維更主張建立強大的軍事實

力不只為了「崛起」，而是為了「和平」，為了要使外國不敢侵犯國門。²⁰

(二)新自由主義—國際建制的觀點

此一觀點強調在全球化環境下實現中國的崛起，不會採取軍事擴張，而是要儘可能地參與和融入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之中。²¹例如：學者時殷弘提出：在全球化和中國愈益捲入世界體系的大背景下浮現和發展的「新國際主義」概念，而「新安全觀」與「和諧世界」理念等則可視為是「新國際主義」的體現。²²其次，學者王逸舟亦提出：「發展需求」、「主權需求」與「責任需求」等三大基本需求，且必須注重區域發展的一致性，尤其是與東協國家和東北亞國家之間和諧的關係，以善盡作為崛起中的地區與全球大國的責任，使國家的發展與世界的進步是互相促進而非相互制約；而這也是中國走向「建設性的和合作性的崛起」的關鍵所在，是中國與世界協同共進的樞紐。²³再者，學者倪世雄指出：中國現已大幅參與和融入世

17 在中國國際關係學門的發展過程中，長期以來中國國際關係理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介紹和評析上，直到1980年末期，中國主要的國際關係學者才將注意力集中到本國的原創性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見王緝思，〈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國外交研究〉，資中筠，〈國際政治理論探索在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306-307。亦請參閱Liang Shoude, "Exploration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in China,"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No. 2, February 2005, p. 16.

18 Wang Yizhou, "IR Studies in China: A Discipline in Transition,"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No. 4, April 2006, pp. 10-12.

19 張文本，〈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國國家利益〉，王逸舟，〈中國學者看世界「國家利益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頁215。

20 潘維，〈關於「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國關在線》，2004年3月14日，〈<http://www.irchina.org/xueren/china/view.asp?id=687>〉。

21 HUANG Ren-wei ed.,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ransition: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Major Powe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 4, August 2008, p. 25.

22 Shi Yinhong, "Strategic Think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deology, Strategy, Challenges, and the 'Chineseness',"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No. 9, September 2009, p. 19.

23 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國外交：探尋新的視角與解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頁36。

界上的主要國際組織和國際多邊機制，在它們的改善與創新中發揮作用，才能用和平改革的方式促使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向公正合理方向發展。²⁴

(三)社會建構主義—自我認同的獨立發展觀點

此一觀點之學者主張中國在發展的道路應力求走出獨立自主的路線，即中國和平發展道路是契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征途中，要始終堅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突顯和保持中國自己的特色。²⁵例如：中共中央黨校前常務副校長鄭必堅強調，中國的經濟情勢仍然脆弱，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同時，要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為了追求和平崛起，中國將致力與所有國家改善關係。²⁶而學者楊潔勉亦認為：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多極化和全球化趨勢的發展，中國開始確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強調以自身的和平與發展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實現與各國的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等理念。²⁷而學者郭樹勇更認為：中國在外交上的獨立自主與政治上的政府主導以及有計畫的市場經濟，都是目前中

國模式的重要內容。而這些也都具體地體現在當前中共第4代領導者，主張在全方位發展各種戰略夥伴關係和開展開放共贏的國際合作中堅持獨立自主，走一條和平發展的新道路的政策上。²⁸

(四)華夏文明—「天下體系」的觀點

學者秦亞青認為：「在中國的『天下觀』之中，天下的結構是等級的，而且只有等級結構才能夠保持體系的穩定和秩序的和諧。上下有序、尊卑有別，才能秩序井然。天下體系的特徵不是霍布斯文化(Hobbesian Culture)，因為體系中的單位之間的關係不是敵對的關係；不是洛克文化(Lockean Culture)，因為這種關係也不是競爭關係；也不是康德文化(Kantian Culture)，因為康德文化中的體系成員關係是平等的朋友」。²⁹而中國華夷體系與西方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之間最大的差異特點，就是華夷體系注重其文化性和禮儀秩序性，³⁰核心國家並不謀求以武力征服或控制周邊國家。這種看似階級的東亞國際體系，實際上反倒帶有其平等性，中國作為區域內統治主導的國家，沒有必要再去入侵周邊國家，這比同一時期歐洲國家名義

24 NI Shi-xiong and ZHAO Shu-guang,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orld Order," *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1, February 2010, p. 25.

25 QIN Xuan,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hina on Other Countries in Asia," *Journal of Shangqiu Teachers College*, Vol. 23, No. 5, May 2007, p. 1.

26 Zheng Bijian,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5, pp. 18-24.

27 YANG Jiemian, "60 Years of New China's Diplomacy: Characteristics of Practice and Evolution in Thinking," *World Outlook*, No. 1, February 2009, pp. 9-10.

28 GUO Shu-yong, "Diplomatic Constituents of the Chinese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Teaching and Research*, Vol. 10, October 2009, p. 44.

29 Qin Yaqing,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ossibility and Inevitability,"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No. 3, March 2006, p. 6.

30 陳文壽，《近世初期日本與華夷秩序研究》（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頁446-447。

上講求平等，而實際上卻以階級差異與發動長期戰爭方式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要穩定的多。³¹

三、「中國崛起」還是「中國『和平』崛起」？中、西方觀點的對話與比較

「中國崛起」與「中國和平崛起」雖然指涉的對象相同，惟對於崛起的方式、目的卻有著極大差異。在中共實行改革開放的歷程中，本身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共與國際社會的關係也同樣發生巨幅改變，國際間出現了許多「中國威脅論」、「中國傲慢論」、「中國強硬論」、「中國必勝論」等不同的論調，³²而中共為了平息國際間的疑慮，自2003年起先是由中共中央黨校前常務副校長鄭必堅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發表了題為「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講演，³³使「中國和平崛起」這個論題，開始受到廣泛討論，接著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國家主席胡錦濤分別利用在國內外重要場合不斷向世界作出關於中國和平崛起的宣告。³⁴至此對於這個相同的政治現象，因為運用了不同的國際關係理論加以詮釋，而有著不同詮釋的結果。

首先在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中，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二者分別以「權力」與「制度」2個不同的核心論點，對國際體系

結構與國家行為進行各自的解釋：新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關係的實質是衝突，國家之間行為的互動，目的在於權力的競爭；另新自由主義則是認為國際關係的實質是合作，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能夠透過國際制度而建立秩序，並且為其利益而不斷努力，因而產生所謂的「絕對收益」(absolute gains)概念。而以Wendt為代表的社會建構主義，將國際體系視為社會體系，欲以包含政治、社會、經濟、歷史與文化等各方面作用的多元研究途徑，打破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單一性無政府狀態論點。

其次，在中國學派國際關係學者中，雖然大部分的觀點仍受到前述西方三大國際關係理論的影響與承襲，惟當「天下體系」觀點被趙汀陽和秦亞青等學者提出後，亦凸顯出中國思想家與西方哲人對於世界制度思考方式的差異與特殊性。對於世界來說，中國所能夠貢獻的積極意義是成為一個新型大國，一個對世界負責任的大國，一個有別於世界歷史上各種帝國的大國。「對世界負責任」，而不是僅僅對自己的國家負責任，這在理論上是一個中國哲學的視界，在實踐上則是全新的可能性，即以「天下」作為關於政治、經濟利益的優先分析單位，從天下去理解世界，也就是要以世界作為思考單位

31 David C.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 67.

32 〈溫家寶：中國永不稱霸〉，《中時電子報》，2010年3月14日，<<http://news.chinatimes.com/realtime/0,5255,110109x112010031400533,00.html>>

33 Zheng Bijian, *China's Peaceful Rise: Speeches of Zheng Bijian 1997-2005*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5), pp. 14-19.

34 Robert L. Suettinger, “The Rise and Descent of ‘Peaceful Rise’,”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Issue 4, No. 12, Fall 2004, pp. 1-5.

表1 中、西方國際關係學派觀點比較表

學 派 觀 點	中國國際關係學派	西方國際關係學派
新 現 實 主 義	強調國家安全利益，主張軍事實力確保和平。	國家透過權力實現安全，也決定在國際體系結構中的位置。
新 自 由 主 義	強調國際建制，主張多邊合作機制和融入國際組織、體制。	強調國家在國際建制下互賴、合作，追求絕對利益。
社 會 建 構 主 義	強調自我認同和獨立發展，欲以和平發展建構和諧的國際關係。	國家在國際社會中以靈活的身分、認同，決定其利益。
天 下 體 系	強調以世界作為思考單位，對世界負責任。	

資料來源：作者歸納整理。

去分析問題，超越西方的民族、國家思維方式，就是要以世界為己任，創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³⁵有關中、西方觀點的比較如表1所示。

基於以上所述，所謂「和平崛起」的模式，主要仍是強調中國在發展過程中與國際體系之間緊密的關係，以及在國際體系經濟領域與安全領域的架構下，使自己的國家行為制度化，以和平互動的模式，讓世界各國認同中國在國際體系中能夠成為負責任的大國身分，進而能夠建立對中國「和平崛起」的認同。因此，中國和平崛起的模式是一種在維護國家主權獨立的基礎上，實現國家現代化，並且在不斷擴大參與國際體系的過程中，融入國際社會。而在國際關係理論的解釋運用方面，中國學者主要參酌了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新自由主義與社會建構主義的觀點以及本身「天下體系」觀點，著重在發展經濟、制度合作、意念互動以及與鄰為善等方面，故筆者稱它是一種「混合模式」

(Hybrid model)，不但加入了新自由主義的制度崛起模式和社會建構主義的意念建構模式，也包容了在「天下體系」中從世界去思考的世界制度內涵。當中國從中將這些特徵加以揉合，並化為具體的政策和國家行為時，即構成在國際現實環境中實踐中國的和平崛起與發展。

參、中國崛起的理論檢視

時至今日，由經濟實力增長所帶動中國在國際之列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歷經中共黨內派系的鬥爭，以及鄧小平在獲得黨內認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主張後，將黨的政策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採取改革開放政策，此後，中共的經濟開始快速成長，³⁶並且對國際社會帶來巨大的影響。而基於對崛起的中國與國際體系政治變化的理解，本節將分從「國際體系」、「國際建制」、「國家身分與認同」以及「天下體系」等四個理論面向，實際檢視中國崛起

35 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政治制度哲學導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3。

36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臺北市：正中書局，1996年），頁50-70。
亦請參見吳曉波，《中國·崛起》（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7年），頁29-57。

現象。

一、國際體系面向

在國際關係研究中，結構分析的核心是強調在國際體系中國家力量對比與配置對國際政治形勢與國家對外戰略有著根本性影響。³⁷而不同的理論學派往往形成不同國際體系觀點，例如：新現實主義者將國際體系視為在無政府狀態下以國家為主要行為者的權力政治、新自由主義者將國際體系視為物質力量和國際制度，而社會建構主義者則將國際體系視為理念分配的問題。³⁸又如學者Waltz強調「兩極體系」是最穩定的國際體系之一；³⁹然以量化研究國際關係見長的Karl Deutsch與David Singer則堅持多極體系較兩極體系穩定的觀點。⁴⁰而學者Morton Kaplan亦從系統理論的途徑，建構出六種國際體系模式：均勢體系、鬆散的兩極體系、僵硬的兩極體系、全球體系、等級體系和單元否決體系等，⁴¹甚至引發學者之間對於結構、體系之間認知以及方法論之間的論戰。⁴²惟無論各學派的主張與研究方法為何，將各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加以歸納而得：國際體系是指由密切連動的各行為主體構成的，具有結

構、功能並與環境互動的有機整體，包括國際行為主體、國際力量結構、國際互動規則和國際機制等四方面，⁴³應為共識之見，也是探討中國崛起後對國際體系的影響以及在國際體系中處於何種地位、發揮何種作用可以進一步作思考的幾個面向。

首先，在形式上，中國幾乎已經加入所有在1945年之後建立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和其他形式的國際建制，而隨著中國的經濟力量不斷成長，使得其在國際經濟體系中亦朝向經濟大國的地位發展。惟「加入國際體系並不等於能在其中發揮作用」，例如中國最初加入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獲得利益與經濟援助，直到20世紀末，中國才開始超越「利益」的概念，開始意識到在國際間主導「議題設定」以及扮演「負責任的大國」的國際領導地位的重要性。⁴⁴

其次，在對國際體系的影響方面，吾人可見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與體系內其他主要行為體的關係愈來愈緊密，相互依賴的敏感度越來越高，因此，中國的崛起必然對體系內其他行為體產生重大影響，且體現在中

37 閻學通、孫學峰，《國際關係研究實用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138。

38 李少軍，〈國際關係大理論與綜合解釋模式〉，郭樹勇，《國際關係：呼喚中國理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36-38。

39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76-183.

40 Phil Williams, ed., *Classic Readings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lmont, Calif.: Thomson/Wadsworth, 2006), p. 94.

41 Morton A.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untington, N.Y.: R. E. Krieger Pub. Co., 1975), p. 34.

42 Morton A. Kaplan, "The New Great Debate: Traditionalism vs. Sci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19, No. 1, October 1966, pp. 11-12.

43 楊潔勉，〈中美應對國際體系轉型的戰略和舉措〉，《國際問題研究》，第3期，2007年6月，頁23。

44 龐中英，〈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角色〉，《卡內基中國透視》，第4期，2006年5月，頁4-5。

國周邊國家經濟發展以及國際體系內其它主要行為體經濟的增長。此外，中國崛起亦對於國際體系內國家行為體獲得安全利益的模式產生影響。而隨著中國崛起的力度、規模和速度的逐步加大，包括硬實力(hard power)和軟實力(soft power)等綜合國力快速成長，使得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快速提升，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作用日益增大。

二、國際建制面向

國際建制是指在國際關係某一特定問題領域中，由行為者之期望匯聚而成的一套潛在或明顯的原則(principles)、規範(norms)、規則(rules)與決策程序(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⁴⁵學者Keohane亦認為，國際制度包括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與國際建制與國際慣例(International Usage)。⁴⁶事實上，一個成熟的國際建制，通常具有國際組織，而國際組織亦可被視為國際建制得以維護與發展的重要條件，當國際組織確實存在，它們便能有助於建制的結構化。在新自由主義中，強調國際建制的利益能使國家進行合作，而新現實主義則強調國際建制的存廢仍不脫離國家權力及國家利益的根本考量。因此，由國際建制的角度觀察中國崛起

的事實，則不能忽略中國在國際組織、國際制度中的作用和表現。

中共在《2007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一書中，曾經對世界各國參與國際組織進行比較研究，其中在中國參與國際組織歷程的部分，區分為4個階段，⁴⁷且可發現自1979年開始，中國從一個堅持自給自足的社會主義國家轉變為一個迫切尋求國際經濟組織援助的角色，⁴⁸為了促進改革開放與經濟建設，成為當時中國參與國際制度的核心目標，而從實際的數據中亦可得知中共將國際制度視為維護和拓展國家利益的工具，因此其從1980年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理事國，隨後又陸續加入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國際農業開發基金(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FAD)等國際組織，與此同時，中國在國際制度中的國家行為表現，亦產生了溢出(spill-over)效應，其不僅引進了新的觀念，影響了中國的外交政策，也促進了中國對其他國際制度參與。⁴⁹

其次，中國在融入國際建制規範中所出現的最大改變時間點，也正是在1990年代全

45 Stephen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Issue 2, Spring 1982, p. 186.

46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9), p. 4.

47 這四個階段分別是：相對孤立（1949年至1970年）階段、消極參與（1971年至1978年）階段、部分參與（1979年至1991年）階段以及全面參與（1992年迄今）階段。見李慎明、王逸舟，《2007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頁295-297。

48 Samuel S. Kim, "China'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China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 431.

49 Margaret Pearson, "The Major Multilater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Engage China,"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216.

球化(Globalization)開始盛行的年代。在這段時期中，對內是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講話後對於中國生產力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力，而外在環境方面，則是受到冷戰結束，國際社會開始出現轉型，中國也同時面臨著「被國際社會接受」與「讓國際社會放心」的國際壓力，而在經濟帶動國力發展的情形下，中國不再將自己僅僅視為一個適應者(suitor)，而開始將自己視為崛起的大國，並開始以經濟籌碼處理涉外事務，⁵⁰也因而建立起以經濟提升中國國際地位的策略。

此外，在分析中國參與國際建制的變化過程中，可以發現國內發展與進步的壓力是中國融入國際社會最主要的推力，而來自國際壓力、國際制度的約束以及互動方式則改變了中共對於國家利益的認知，⁵¹而此也促使中共在變動的格局中，不斷地調整外交戰略。隨著中國進一步地參與接受國際制度的規則，這些規範更對於中國在國際政治上的認知產生著內化的效應。

三、國家身份與認同面向

所謂國家的身分認同可定義為：「國家在國際體系的互動中，對自身所屬國家類別的一種認同，且由於這種認同，國家會對不同類型的國家採取不同的戰略思維和行為」。在中國融入國際制度的過程中，除了受到不同的內外環境影響而會不斷調整國家行為

的策略，另一隨之改變的則是國家的身分和認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實力不斷地增強，與此同時，中國面對國際社會的各種不同反應亦不斷調整國家身分，其中最受到關注與爭論的議題，就是「中國崛起」和「中國和平崛起」，或是說中國的崛起是否是一種威脅，抑或是中國能否奉行和平的發展的道路，而無論中國實質發展的策略與目的為何，在國家身分中首先要處理的問題，就是「形象」(image)的問題。根據國際媒體BBC每年委託專業民調機構GlobeScan針對全球各國國際形象調查，可發現中國的國家形象與其他國家相較，自2005年以來持續呈現下降的趨勢(如圖1所示)，而著名的政體資料庫(Polity IV)以及國際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每年針對世界各國進行人權和民主程度進行相關指標之檢測，其中中國在2009年和2010年分別被評為「-8分」以及「不自由」(not free)⁵²(如圖2、3所示)，由此可見，中共距離讓國際社會相信與信任其所稱「和平發展」戰略仍有極大的提升空間。此外，中國也必須正確瞭解自身在國際社會的角色定位和以及他國和世界如何看待中國，唯有如此，才能作出利於本國發展的戰略決策，避免在融入國際社會的過程中身分認同的困境，進而為實現和平崛起創造條件。

50 Avery Goldstein, "Great Expectations: Interpreting China's Arriva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3, Winter 1997/1998, pp. 36-73.

51 Alastair Iain Johnston, "Treat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s Social Environmen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5, No. 3, December, 2001, pp. 487-515.

52 「自由之家」主要是以政府功能、政治多元及參與和選舉過程等作為政治權利分數之衡量指標，其分數最低為0分，最高為40分。另一方面，由Ted Robert Gurr等學者所創立主持之「政體資料庫」第四版，亦為衡量各國民主、自由程度常用的指標，其分數範圍介於-10分至+10分，負值代表威權國家，正值代表民主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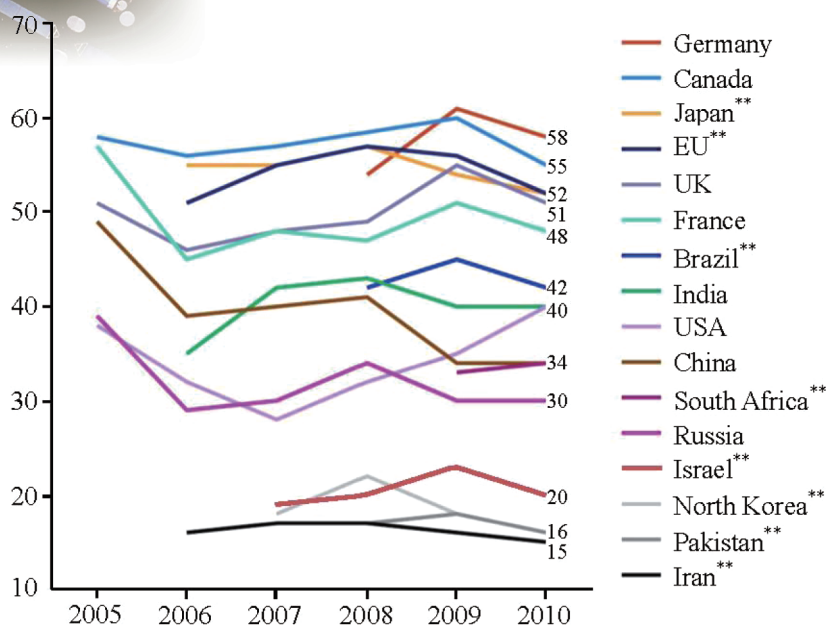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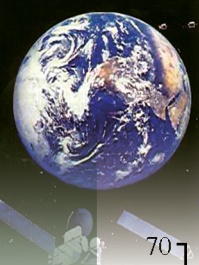


圖1 2005年至2010年世界各國影響力形象調查追蹤圖

資料來源：World Public Opinion, see http://www.worldpublicopinion.org/pipa/pipa/pdf/apr10/BBCViews_Apr10_rpt.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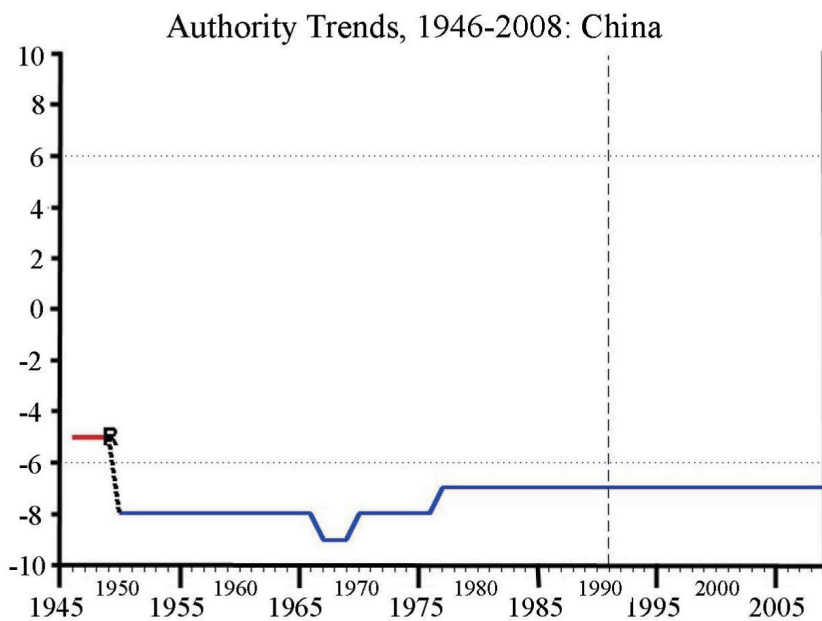


圖2 2009年中國政體指數評比圖

資料來源：Global Report 2009 Conflict, Governance, and State Fragility, see <http://www.systemicpeace.org/Global%20Report%202009.pdf>

其次，在中國國家身分的實際轉變中，筆者認為可概分為4個階段：自1949年建政後起算，中共先將自己界定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至1957年因為與前蘇聯在對共產主義的認知出現分歧，在毛澤東的主導下而將自己修正為「革命的社會主義國家」，到了1977年再因為鄧小平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而逐漸認為自己必須成為國際體系中的一員，而到了現在，在國際間形成區域聯盟以及以非國家行為體亦開始參與和影響國際事務時，中共又將自己界定為東亞共同體之中的一員。這一連串的歷程演變，可見中共在與國際間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的互動過程中，已逐步形成了自我的「民族—國家意識」，亦即中共開始以國際體系的角度來界定自己的集體身份，也符合了Wendt所言：現在國際體系的重要特徵就是許多前共黨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採用了西方國家的制度和觀念，這似乎是有模仿的作用。但這種趨勢卻是以預設集體身份的存在為先決條件的，國家希望成為這種集體身分的一部分。⁵³

按照上述這種思維，對當前中共第四代領導人經常倡言

53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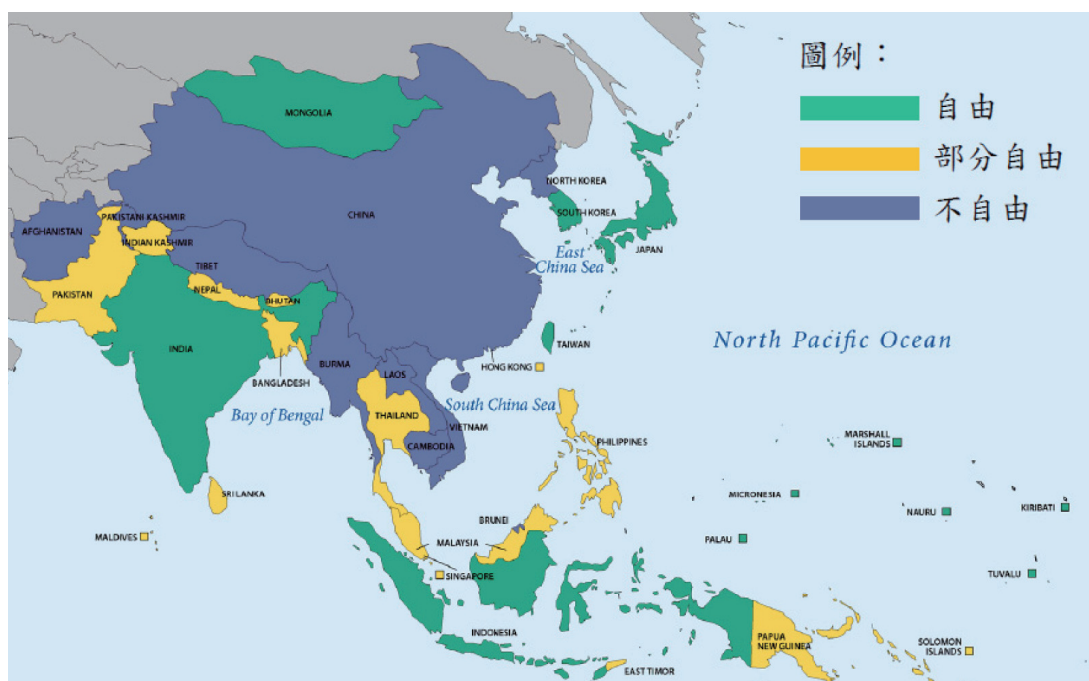


圖3 2010年中國自由度指數評比圖

資料來源：Freedom in the World 2010, see http://www.freedomhouse.org/uploads/fiw10/FIW_2010_MOF.pdf

的「和平崛起」、「堅持防禦性國防政策」、「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永不搞擴張」與「永不稱霸」等說辭，⁵⁴可以發現中共領導人對於國家與國際體系之間關係的身分認同是靈活的，當西方國家稱中共是「大國崛起」時，中共能夠從國家內部與國際的身分認同加以評估，而提出中共追求的是「和平發展」，強調中國的經濟發展要與經濟全球化相聯繫而非相脫離；中國在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同時，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且這是一條奮力崛起而又堅持和平、堅持不爭霸的道路。⁵⁵

四、天下體系面向

「朝貢體系」是否將在東亞重現？這

個問題自2008年中國率先成功度過金融海嘯(The Financial Tsunami)的考驗後，隨著「中國模式」議題的出現而不斷地被相關學者提出來討論。學者Martin Jacques在《當中國統治世界：天朝的興起與西方世界的終結》(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一書中，就認為自1648年國際關係進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來，人們一直認為民族國家(nation-state)是組成國際社會的基本單元，並習慣於用「民族國家中心觀」來分析問題，惟作者認為這並不適合中國。中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將不會如西方國家所設想的走向西方的發展模式，且會將中國歷史上的

54 Ron Huysken, *Rising China: Power and Reassurance*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05-107.

55 鄭必堅，《論中國和平崛起發展新道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5年），頁1-8。

朝貢體制或思想附加到這個世界。⁵⁶

學者張啟雄在研究兩岸關係的途徑中，亦曾經提出「名分秩序論」，其中在「秩序」的部分係根據《論語》〈顏淵〉的詮釋，以「君臣」、「父子」的邏輯論述，企圖將天下的秩序由「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無道，回歸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有道。⁵⁷而若從「天下體系」觀點來解釋中國傳統華夷體系中的國家關係，也顯現出四大特點：第一，是「以小事大」，即小國透過進貢的方式表示大國的至誠；第二，是「以大事小」，即大國對小國施以「尸鳩之仁」，透過公平賜予的方式，讓小國獲得實際的物質利益；第三，是「懷柔遠人」，即在國家危急之時，核心大國必須提供小國軍事上的協助；第四，是「相互交鄰」，即大國與小國間和平相處，互為善鄰，大國、小國在彼此形成的關係中，善自其位，以達天下太平。

基於以上所述，雖然朝貢體系在清代以後退出了歷史舞臺，惟這種以中國為核心的特殊東亞國際秩序模式，卻呈現出有別於舊歐洲世界秩序形成的最大差異。時至今日，當中國在20世紀末成為崛起的大國，可以發現在東亞地區再次出現許多國家正試圖進一步靠攏中國的現象，然而若再仔細觀察這些亟欲向中國建立合作關係的國家，似乎皆有共同的特點，就是僅在「經濟」議題上尋求

和中國的合作，且愈趨顯得「相互依存」的重要，然在政治制度與國家發展戰略方面卻逆向出現對峙的局面，例如：北韓與緬甸兩國並未被「中國模式」所吸引；而越南與巴基斯坦二國更是在政治上對中國感到不安，進而與美國發展軍事上的合作甚至舉行聯合軍演。這種弔詭的東亞秩序現象，凸顯出中國目前雖然主導著自己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也或許有可能恢復過去在東亞的中心地位，惟因當今主權觀念已經成為中國與周邊國家共有的行為規範，東亞地區國際關係孤立發展的時代也早已成為歷史，過去那種朝貢體系關係在全球化時代，即使再出現一個中國主導的互動關係模式，也肯定不會是歷史上朝貢關係的再版，而是朝向建立東亞共同體秩序的模式。⁵⁸

肆、中、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解釋力與侷限性

本研究先後探討了西方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與社會建構主義等三大國際關係主流理論之內涵，以及中國學派的國際關係學者在擷取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主要觀點後，針對「中國崛起」所提出的「國家安全利益」、「國際建制」、「自我認同獨立發展」以及「天下體系」等論點，而在進行理論的實際驗證，亦可發現中國在融入國際體系、加

56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New York: Allen Lane, 2009), pp. 291-292.

57 張啟雄教授意指：治天下之道，乃在於制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讓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各按照自己的名份行事，天下才能回歸秩序。見張啟雄，〈兩岸關係理論之建構——「名分秩序論」的研究途徑〉，包宗和、吳玉山，《重新檢視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市：五南圖書公司，2009年），頁117。

58 Zhang Xiaoming, "Regional Identity and Northeast Asian Community Building," *East Asian Review*, Vol. 9, March 2005, pp. 117-123.

入國際建制以及在建立國家身分與形塑朝貢秩序等方面，各種理論仍有其擅長的解釋力和不足，而本節基於對理論本質與特性的掌握，續以「中國崛起」為例，釐清分析國際關係理論對於政治現象的描述、解釋能力，並且評估「中國學派」的發展。

一、理論本質對「中國崛起」認識之差異與侷限

在對中國崛起這個政治現象分析方面，新現實主義過於強調國際體系結構的物質性，即國際體系的結構是由權力，特別是軍事力量對比決定的。而從這種物質權力決定論的角度往往會得到：一國在國際體系中的相對權力位置與該國奉行的對外政策之間，存在必然的關聯性。當中國開始崛起，實力相對強大，權力急劇膨脹，進而在區域乃至全球的大國實力對比中處於相對有利的位置時，它的國家利益就會體現出打破原有「不合理國際秩序」之行為。然而實際上，中國

的崛起是否必然會以軍事力量作為權力擴張之手段，顯然無法如此單純地做出評估，且應納入國際結構中非軍事等多重因素。

其次，新自由主義令其支持者認為「經濟互賴」所構成的經濟全球化可以提供一個穩定的國際體系秩序，使得世界上的強權國家與新興大國皆能在基於成本效益之理性計算下滿足現狀，亦能藉由國際制度，化解國際間的紛爭，並且傾向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將逐漸降低，而經濟利益之利害議題將逐漸加劇。⁵⁹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從經濟全球化與相互依賴架構中的弱國逐漸成為強國，⁶⁰在此其中令吾人見識了以新自由主義為特色的「華盛頓共識」⁶¹對各個發展中新興國家的影響，卻也見證了國際金融危機和金融海嘯為中國的發展模式提供了「北京共識」⁶²與「中國模式」⁶³之反動；此外，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反恐戰爭也因不斷遭受伊斯蘭世界的不友善回應，而顯現西方自由民主價值在

59 David A. Baldwin,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01-338.

60 丁松泉，《中國崛起與中美關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頁219。

61 1989年12月，美國國際經濟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John Williamson提出了旨在解決拉美地區國家經濟發展危機的「華盛頓共識」，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支持下，「華盛頓共識」的主張成為許多發展中國家在90年代經濟發展策略選擇的途徑，且深受其影響長達十餘年。see Narcis Serra and Joseph E. Stiglitz,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considered: Towards a New Global Governance*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

62 美國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高級顧問Joshua Cooper Ramo於2004年5月在英國倫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發表一篇題為《北京共識：論中國實力的新物理學》(The Beijing Consensus: Notes on the New Physics of Chinese Power)的論文，由於他拒絕了過去以新自由主義為發展架構的論述，因此Ramo的觀點，引起了各界關注和議論。see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Press, 2004), pp. 7-51.

63 中外學者目前對於「中國模式」之看法仍然眾說紛紜，例如中國學者趙穗生認為：中國模式常成為用來描述經濟自由和政治管控結合的簡略表達方式。而美國學者Stefan Halper則認為中國模式從某個層面而言，係指中國過去30年來的發展和改革歷程所累積而成的一種綜合體，由於其沒有一套可以移植到拉丁美洲或是撒哈拉非洲的模式，因此還不能說是已經建立起一種模式。見趙穗生，〈中國模式探索：能否取代西方的現代化模式？〉，潘維，《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60年》（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頁285；Stefan Hal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p. 32.

當今所遭遇的挑戰。這些事例映證了民主、和平與戰爭的問題在新自由主義的推展下，並未獲得圓滿的解決，也凸顯了新自由主義過度強調國際經濟活動的制度性安排，卻忽略了國際關係仍會受到權力衝突、文化因素與意識型態等因素所影響。

再者，社會建構主義將國家行為視為國際社會建構的結果，注重國內的歷史、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作用，因此必須脫離理性計算的解釋模式。⁶⁴然而這種論述仍然過於抽象，亦即雖然吾人能夠理解中共對其國家本身的身分認同，將會影響其國家行為，但若從實際的國家行為加以觀察，仍然無法提出其行為必然就是身分認同所產生結果，而仍有可能受到國家利益、權力擴張等因素影響。因此，吾人或許可以推論中共根據現階段的國家身分認同，提出了「和平發展」立場，但卻無法證明中國的和平發展只因身分認同的結果所產生。有關社會建構主義在因果關係之論述上，尚無法成功地整合實證經驗結果，而這是在解讀中國崛起現象時所顯現之限制。

二、中國學派的未來發展和瓶頸

受到國際局勢的變遷以及國家內部對於改革發展的迫切渴望，中國自1978年決意採行改革開放路線，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中國自此開始積極涉入國際事務、融入國際體系，因此當這種趨勢愈顯明確時，使得在學術上展現知識性的「中國學派」國際關係理論學者，亦開始影響具有實踐性的中國發

展模式。在理論與實際經過30餘年的揉合，更使得在當前探討「中國模式」時，更能從中萃取中國國際關係學者具有中國特色的觀點。

學者Mark Leonard在《中國怎麼想？》(What does China Think?)一書中，曾探討了中國知識分子在中國現代化發展過程的角色，並指出像是汪暉、張維迎、俞可平和潘維，以及鄭必堅、閻學通等人在中國以外或許無人聞問，但西方人很快就會發現渠等的想法將因改變中國，而使自己認知的世界也隨之改變。因為這些人所說的話會傳入中共的領導階層和政府中，他們的改革計畫也確會影響中國的政治、經濟與外交政策。他們的論點也造成了中國內部保守與改革左右兩派持續的論戰，而在這些關於國家大小、政治改革等爭論不休的議題中，產生的則是屬於中國特有的哲學理念。⁶⁵

雖然中國國際關係學者在建立「中國學派」的方式、步驟與途徑等方面，提出了各種面向的主張與建議，也企圖能夠像「拉美學派」、「英國學派」一樣，在國際關係理論中樹立特定的地位，惟誠如學者許嘉所言：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出現的問題仍侷限在：理論創新的欠缺，⁶⁶或如學者王逸舟所認為：中國國際關係學缺乏對本體論(ontology)、認識論(epistemology)及方法論(methodology)上的爭論，缺乏高品質的計量分析，缺乏邏輯嚴謹性、哲學反思與批評，缺乏理論創新與學科借鑒，以及缺乏國內外

64 Alexander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No. 2, June 1994, pp. 384-396.

65 Mark Leonard, *What does China Think?* (New York, N.Y.: PublicAffairs, 2008), p. 18.

66 許嘉，〈20世紀末的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肖歡容，《國際關係學在中國》（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7。

學術界之交流平台，⁶⁷對於後續的發展仍有諸多在方法論上的歧見需要克服和整合。

三、以國際關係理論檢視中國崛起之新思維

在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過程中，每一次在國際中發生的重大國際事件總會對它產生考驗與挑戰。從歷史的角度加以檢視，自1980年起迄今在國際間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前蘇聯與東歐各國進行的經濟改革、德國的統一、華沙公約組織的解散、蘇聯的解體、國際兩極格局的崩潰、中國的崛起等，皆令從事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研究者在理論的運用、解釋與反思時，必須遭遇快速變遷的國際環境而謹慎以對。更有學者認為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及其批評者都沒有預測到自20世紀末起發生的這些國際局勢改變。⁶⁸

本研究欲解釋的對象是「中國崛起」，藉由上述的討論，雖然能夠發現各種國際關係理論觀點的特色，甚至在國際關係理論第三次大辯論後亦出現「新新綜合」(neo-neo Synthesis)之觀點，⁶⁹惟這些理論之間的論戰結果仍屬未定之天。吾人在探討中國崛起等國際政治現象，仍應注重方法論與研究方法的實際運用，才能得到客觀的解釋。

(一)國際關係理論之方法論評估

無論是西方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社會建構主義或是中國學派「天下體系」的觀點，在體系層次的變數皆可歸納為「結構」(structure)，即它們分別強調以權力、制度、文化與世界作為解釋國際政治現

象之自變項，然而事實上當在解釋國家行為時，卻仍然難以避免中介變項的干擾。例如：Waltz所主張的權力是透過結構影響的，並且又透過競爭與社會化二種方式來影響國家行為；Keohane強調的國際制度是透過影響國家對利益的認知以及不確定性與降低利益成本等進行的。Wendt的意念是透過國家身分認同，進而影響國家對權力和利益的認知，最後才影響國家行為與互動模式。而學者趙汀陽將世界理解為：「物理世界」(大地)、「心理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意)以及「政治世界」(世界制度)三者的統一體，更是一種在本體論上就有別於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觀點，並且從哲學的觀點，提供一種高於任何國家觀點的世界觀。他將世界看作是個有精神意義的存在，而不僅僅是個物質的存在；將世界看作是自身具有目的和理念存在，而不是無目的性的對象。⁷⁰

上揭現象呈現出一組矛盾問題：第一，科學理論的構建要求達到簡約原則，只有簡潔的理論才能解釋普遍現象與大範圍的事物；第二，以演繹方式構建的理論、以單一變項發展的理論又必然存在解釋力的問題，尤其是它們並不擅長解釋單位層次與單位互動層次上的國家行為。由此可知，理論能夠解釋的範圍與解釋力是一組相對的難題。吾人在研究中國崛起議題時，惟有站在同一層次，以理論的本質相互補充，才有可能求得周延。

(二)國際關係理論之應用評估

67 王逸舟，《中國國際關係研究（1995-200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44-46、59。

68 Peter J. Katzenstein,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

69 Steve Smith,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p. 163.

70 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政治制度哲學導論》，頁136、140。

以國際關係理論檢視中國崛起，就像是在自然科學實驗中，以三稜鏡觀察光線折射的原理一樣，往往呈現出不同的角度與色彩結果，例如：以新現實主義的角度檢視中國崛起，其國力的增強對其他國家而言就是一種威脅，但若以新自由主義與社會建構主義的角度檢視，中國的崛起並不一定會產生威脅，其中有可能會以競爭合作，取代軍事衝突，亦有可能以行為者之間的集體身分認同，決定利益所在。其中又可以近期中共在全球金融海嘯之適應調整加以證明，僅從權力的角度來認識中國的國家利益是有偏執的。

其次，在觀察當前中共的國家行為可以發現，中共將本身視為一名具有反思能力的行為者，並認為國家是一種制度、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其國家的身分也在國際體系與國內分別被塑造，且相互影響。而這些可以從中共自1978年放棄極左的意識型態，改以務實之發展路線，並利用經濟發展增強整體國力，⁷¹以及與國際社會頻繁活躍地互動等事例，證明當中國與世界各國的關係愈來愈緊密時，其國家身分亦同步在改變。這些實際現象，皆與中國崛起密切相關，然欲瞭解其背後隱藏之意涵，無異需以多元的理論檢視互補，方可面面俱到。

伍、結 論

國際關係產生的型態，就如同個人人際關係的建立方式一樣，受到成長的背景條件、個性和舉止等因素影響，而當吾人在檢視一個國家的國際關係時，也必須注意該國

位處的地理環境、民族性以及採行的發展制度等。中國亦是如此，其有著固有朝貢文化之歷史淵源，也受到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國家強調以主權獨立平等相互交往的原則所影響，更在1949年後歷經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等不同意識型態的交相影響，以及在1990年代後「全球化」國際趨勢的洗禮，進而在後發國家之列，建立起特有的中國發展模式，並且以大國崛起之姿，對國際體系、國際制度等各層面產生不同程度的作用與影響，而此則是在運用不同國際關係理論或中國學派學者觀點探討中國崛起時必須兼顧多元視角的最重要原因。

本研究以「中國崛起」為例，從中、西方各種國際關係理論的觀點，討論中國崛起的實際情形，以及理論在解釋現象的適用性和侷限性，得到以下發現：

首先，在中、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解釋力和互補性方面，新現實主義基於國家是國際體系中的行為主體，為求安全的最大利益，必須藉由權力的大小來確保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因此，當中國成為崛起中的強權，且對國際霸權國家形成威脅，或與其他國家共同競爭利益，中國崛起必將介入和改變現有的國際秩序。另一方面，若從當前中國領導階層將國家發展定調為「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以及「和諧社會」等漸進式改革的路線，其所凸顯的特點則是中國意圖在融入國際體系和參與國際建制的方式上，將採用新自由主義的多邊合作主張，而在形塑國家形象方面，則會善用社會建構主義中強調的身分、認同，著重軟實力的作

71 C. Fred Bergsten, ed., *China: the Balance Sheet: What the World Needs to Know Now About the Emerging Superpower* (New York : Public Affairs, 2006), p. 120.

用，並以天下體系觀點強調將對世界負起更多責任。由此可知，各個學派的國際關係理論在解釋中國崛起時，彼此之間並非相互排斥，而是具有相互補充的作用。

其次，在中國學派的發展方面，更是在同一時期因為在國家發展戰略上採取的路線已逐漸融入國際體系，使中國在處理涉外事務方面，必須接受和西方國家共處的原則、規範，因而在理論建構的過程中，雖然有強烈的企圖欲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然而在受到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深刻的影響，似難以跳脫或超越既有框架，且在該領域內部仍存有內部分歧的問題亟待解決。不過，有一較為特別且值得持續關注其發展的觀點則是基於華夏文明的朝貢體系觀點所發展出的「天下體系」世界觀，它有別於西方世界的國際關係理論本體論，也與古來的朝貢秩序論不盡完全相同，這種揉合了古今「天下觀」之觀點，或可做為未來中國學派建構理論的基礎，惟可以確定的是在這種思維下所建立的東亞秩序體系模式，將不會是恢復17至19世紀明清二代所建立的華夷體系，而是與西方國家以「民族國家中心論」相互結合的共同體型態。

再者，本研究嘗試從理論的角度去分析中外學者對於「中國崛起」與「中國和平崛起」不同的認知和看法，雖然各種理論從本位的角度去解釋中國崛起現象結論各不相同，且對於中共而言無論是欲以中國和平崛起來回應國際間的疑慮，或是以和平發展的相關說辭來和緩國內保守派學者對於和平崛起的質疑，對於中國當前的發展，仍可歸納為幾項重點：第一，中共必須謹慎處理國家形象的問題，即「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固然值得提倡，惟如何真正獲得國際間

的認同與信任才是實際的問題；第二，當中國的「硬實力」發展已被他國視為威脅時，其「軟實力」的運用則為決定中國是否能為國際社會接受的關鍵；第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的領導者將全球化視為重建中國國家的獨特機遇，而當中國的領導者選擇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模式」時，它所代表的意義除了有影響中國未來的發展外，尚包括了中國最終能否以「王道」取代「霸道」；以「善霸」取代「惡霸」，而在國際與區域中善盡「負責任大國」的角色。

最後，有關「中國崛起」與「和平發展」仍然是個變動中的概念，它受到許多複雜的內外中介因素影響而不斷地改變。因此，本研究從中、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途徑去分析此一政治現象，所欲強調的是一種多元的研究態度與視角，畢竟在社會科學的理論中，沒有任何一個理論能夠自稱完美、周延，遑論要在符合嚴謹的科學邏輯程序下加以解釋。而研究者如何能夠掌握適切的研究途徑與方法，端賴深入認識與瞭解各學派在方法論上的主張，方能正確、客觀的從事研究。

收件：100年02月10日

修正：100年04月12日

接受：100年04月19日

作者簡介

董慧明中校，國防大學理工學院82年班，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碩士；研究領域為國家安全、情報與反情報、大陸問題與兩岸關係、軍事政治學；現為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